



## 扬子江畔的红色“船”奇



■李慧颖

黑色的船舱,白色的船室,船身挺立一根黑色烟囱……在大唐南京发电厂(以下简称“南京发电厂”)办公楼大厅内,一艘名为“京电号”的轮船模型格外引人注目。据说,它是为庆祝电厂百年华诞、双机投产,由电厂职工按“京电号”6:1的比例还原制作而成,真正的“京电号”原船,则珍藏在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,现为纪念馆内的国家一级文物。

“京电号”是一艘什么船?它与南京发电厂有什么关系?又为何会珍藏在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?

坐落在扬子江畔的南京发电厂,前身是创建于1910年、点亮南京第一盏电灯的中国第一家官办发电厂——金陵电灯官厂。1912年,金陵电灯官厂更名为江苏省立南京电灯厂,于1919年在江边建立分厂,定名下关发电所,南京发电厂的历史由此启航。在与共产党共同成长的革命和奋斗历程中,这座电厂浴火重生,运煤小轮船“京电号”更是在1949年的渡江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,被誉为“渡江第一船”,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“小火轮”。

1925年,“京电号”小火轮由上海沈宝记船厂制造,是一艘钢质蒸汽机动船,长23.1米,宽4.25米,总

吨位41.4吨,主要负担从浦口火车站往下关发电厂运送煤炭的任务。

1949年4月20日,国共和谈谈判破裂,随后,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,百万雄狮在西起九江、东到江阴的1000余里战线上横渡长江。

大军要渡江,没有船不行,但国民党政府下达了“封江令”,采取一切手段,对长江下关段两岸的船只进行破坏,将江北的船只收归南岸或沉船堵塞河港,将搜罗到的江南大小船只拉到内河里严格看管。

当时,国民党为了军事需要,还下令电厂不能断电,并在“京电号”上贴上不准动用运煤船只的布告。中共地下党组织带领电厂工人巧妙地利用这个命令和告示,在各种危机之下,始终将“小火轮”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。

1949年4月22日上午,两个国民党士兵来到电厂码头,执意要用船。船工黄纪发、吴诚聚、钮其郎将目光落到布告上,吴诚聚走上前说道:“老总,这是发电厂的运煤船,你们上司有命令,谁也不允许动用!”两个敌兵朝布告上打量一番,只好走开。他们走后,船工们更加小心,急忙将船紧贴码头,隐蔽在吊煤机的下方。

1949年4月23日中午,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和密集的枪声从浦口方向传来,长江北岸的国民党部队仓皇逃回南京,守在长江南岸的国民党部队则向城南退去。出于安全考虑,黄兴发、钮其郎、吴诚聚、戴仁芳、缪金泉、黄纪发6名电厂船工给

“京电号”小火轮加好煤、压好火,做好相关防护准备后便离开了,他们急切盼望着解放军能快点打过江来。

快天黑时,解放军35军103师的5名侦察兵出现在下关电厂门前,他们发现了“京电号”,并请求支援。6名电厂船工迅速回到电厂,并以最快速度升火启动,劈波斩浪,直奔江北。

这一夜,6名船工冒着生命危险,驾驶“京电号”往返于下关浦口之间,在渡江战役中,“京电号”运送了6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过江,为渡江战役胜利、解放南京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1949年-1950年,国民党反动派多次轰炸南京,重点轰炸电厂机组和设备,为保证南京军需和社会用电,“京电号”始终坚守在运煤第一线,为机组发电提供源源不断的燃料保障。

全国解放后,“京电号”继续在南京下关电厂服役,并在长江马鞍山段抗洪抢险中成为“救灾船”。1978年,“京电号”离开了服役30多年的南京,被调拨至淮阴电厂,之后于1982年被调拨给连云港市灌南县灌南鸿远运输有限公司从事货物运输,编号“苏淮605”。在此期间,为适应货物运输需要,它由蒸汽机船改为柴油机船。

2009年是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60周年,阔别30年多后,“京电号”又回到了南京,存放于渡江胜利纪念馆,自此成为纪念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,继续向世人讲述那段扬子江畔惊天动地的红色“船”奇。

(作者供职于中国能源报)



## 父亲的初心

■马俊杰

父亲生于1934年,十一二岁起就给地主家当长工放牛,一天能挣回一个黑面馍馍。1949年9月的一天,家乡甘肃省玉门县迎来了和平解放酒泉城后挥师西进的解放军,刚刚15岁的父亲听说部队能吃饱饭,还能穷人做主,就扔下牛鞭参了军。

1950年3月,父亲随部队转战西南,参加了广西剿匪战役,后整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39军赴朝鲜参战,从朝鲜回国后,先后在西安、兰州部队工作,还参加了甘南剿匪战役。后来,因病重的祖母日夜思念多年未见面的儿子,在一封封家书的催促下,父亲于1959年底带着满身伤病转业,离开了部队,放弃了组织上安排的工作回到老家,在黄土地上默默耕耘了一辈子。

回乡后,父亲一直在大队工作,家里上有老下有小,孩子多,全生产队里,我家的日子过得最紧巴,直到包产到户后,才逐渐好转。父亲不让我们和别人家孩子比吃穿,只严格要求学习争先,他常说,只有学到知识,才能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。

父亲一辈子对部队怀有深厚感情,我们兄弟三个到了十八岁都去验过兵,最后只有二哥如愿以偿入伍,到新疆塔城军分区守卫边境线13年,后转业在新疆工作。

去年10月,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,父亲老早就盼着这一天,他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,目不转睛盯着屏幕,双手紧攥,情绪亢奋,目光中闪现出久违的激动。当穿着志愿军军装的老战士代表们蹒跚步入会场时,他激动地站了起来,仿佛要走进电视中和战友们拥抱,随后又感到无法如愿而神情落寞。

今年元旦前夕,地方政府给父亲送来了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”纪念章,父亲接过纪念章,眼含热泪,并反复念叨着:“国家没有忘记我们,没有忘记……”

这些日子,每次看到电视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的新闻,年近九旬的父亲时而久久凝视屏幕沉默不语,时而一个人打着手势唱起“雄赳赳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……”我知道,他又沉浸在战火纷飞的回忆里,又想念那些牺牲的战友们了。

70年前那个沉沉的黑夜里,当父亲与战友们手握钢枪,背起行囊,义无反顾跨过鸭绿江时,我想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听党指挥,保家卫国。

战火纷飞中,与父亲同期入朝参战的35名玉门籍战士,1953年10月只有两人回国。“都是多么好的小伙子啊,一个个那么英勇,11点冲锋,下午2点不到就牺牲了……”每次喝点酒,父亲都会重复这句话,而且总是一边感叹,一边抹眼泪。

父亲从不看战争题材的电影,以前村里放露天电影,他不看,后来家里有了电视,他还是不看。小时候我和两个哥哥腰里别着木头手枪,用马莲草绑腿,打打闹闹时,他总是虎着脸:“打仗有什么好玩的,还不回来好好写字!”

父亲有个鲜红的小本本,一直压在箱底,我识字后才知道,那是转业军人证明书,上面有毛主席头像和“发扬革命传统,争取更大光荣”的题词,还有鲜红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”印章,照片上的父亲英姿勃发,斗志昂扬。父亲还有一枚“入朝作战纪念章”和一枚“三等功军功章”,可惜都被我们小时候偷偷翻出来挂在胸膛上“打仗”时弄丢了。

十五从军行,百战存一息。父亲已入耄耋之年,而他那些牺牲的战友们,那些长眠于异国他乡的鲜活生命,已化为满目青山,远远守望着他们心心念念的祖国,守护着保家卫国的初心。

(作者供职于甘肃省水利厅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局)

## 晋北安太堡 种下“试验田”



■朱妍

高大的身材、爽朗的笑声,说话间,一双布满老茧的大手有力地握了上来。眼前这个古稀之年的老人,正是人称“平朔第一铲”的老党员王天润,一搭手,便知道他浑身仍藏着干劲儿。

1985年7月,在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开工仪式上,凭借过硬的技术和娴熟的操作,王天润开着液压铲车挖起了第一铲土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个、也是最大的中外合作经营项目,安太堡矿的建设备受关注,光是现场见证开工的中外记者就有上百人。

由于是中外合资“首单”,合作面临不同制度和文化的碰撞,很多如今看来稀松平常的事,当时几乎都是在争议中敲定的。“安太堡矿的每一步发展,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走过来的。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,在反差中寻求共性,是我们中方管理者始终坚守的原则。”王天润坚定地说。

彼时,按照美国西部矿山动态管理方式,采用现场换车不换人,卡车坏了立刻停下,换一辆新车继续工作。“外方觉得车辆无需定员管理,谁开到哪辆车就是哪辆,坏了放到一边,由维修人员拉走。为了追求时间就是效率,即便在休息期间,车辆也不熄火,柴油可劲儿烧,把我们的老工人心疼坏了。他们认为,提高效率无可厚非,但绝不能造成不必要的浪费,于是要求四人固定使用一辆车并负责到底,这样出现问题才可以追溯,同时避免违规操作造成车辆损坏。”王天润举例说。

还有一件小事令王天润记忆深刻。安太堡矿实行72、72、73工作制,外方的“备忘录”管理制度十分严格,所有职工的工作情况都通过计算机管理,违纪一次就以备忘录的形式录入计算机。“记满三次,他们就会说‘我不希望再看到你’,意味着你被开除了。”

当时,夜班休息时间为凌晨3点至3点半,可以吃夜宵、喝咖啡,有些卡车司机为了提神,偶尔会抽几口香烟。一次,有个司机在驾驶室内仰头翘腿,边吸烟边休息,由于卡车很高,驾驶室离地面足足3米多,外方人员在地面看到有人把腿从窗口伸出来,认定其在睡觉偷懒,立刻记上一笔,任凭司机怎么解释也没用。

“一听说要扣钱、开除,工人急得直哭。这时候我们党组织必须出面,帮助工人维护合法权益。”王天润说,工会人员一边安抚工人,一边耐心向外方解释:“烟还点着,人怎么可能在睡觉呢?而且你们一叫,工人马上就下车了。姿势不对可以批评,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开除。”

秉持开放学习的态度,中方的管理思想也在进步。按照要求,卡车所用的空气滤芯器,到期必须更换,老工人觉得东西没坏,舍不得扔,拿风管吹吹灰尘还能继续使用。这时,外方人员不干了:“请给我一个数据,怎么证明它还能使用。”

“我们说,滤芯本来就是挡灰的,吹干净就行了。可外方人员认为,经过反复试验,滤芯使用一定时间要强制更换,因为一辆卡车是一个整体,重复使用一个不合格的部件,很有可能造成车辆损伤,必

须强制保养。”王天润坦言,起初很多人不理解,但经过深入思考,大伙儿一致决定接受建议。“既要勤俭节约,也要讲究科学管理设备。回过头来看,就像现在咱们自家开车,到一定里程就得保养,到什么时候换什么配件,是有道理的。”

与外方磨合与交汇中的故事,不止一个。很多人说,安太堡矿犹如一个“活广告”,它让外国人看到了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广阔的前景,尤其看到了中国人自上而下的改革开放决心。“我们与外方合作六年,一起工作、学习、娱乐、开表彰会,他们很看重矿上颁发的荣誉,不少人回国后还专门把奖状挂在墙上。渐渐地,外方人员发现,矿上最认真努力的那些工人,遇到困难冲锋陷阵的那批人,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中国党员,因此也越来越支持企业党组织开展工作。”王天润回忆。

上世纪80年代,安太堡矿区所在的山西朔州还未建市,“改革开放”还是一个新词。正是因为安太堡矿在改革大潮中率先发力,内陆省份才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,在晋北大地上开拓出的这块煤炭产业“试验田”上,在文化的交融中,人们认识了牛仔褲、收录机,更看到了方兴未艾的科技革命。

“我在这里工作了32年,退休后继续住在矿上的生活区,见证了安太堡矿的成长与变迁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倡导和推动中外经济合作的开篇之作是安太堡矿,而其建成投产,也为全面改革开放总结了经验、树立了形象。”王天润话语中充满自信。

(作者供职于中国能源报)

紅軍不怕  
遠征萬里  
水盡山窮  
等閒視之  
透迤五嶺  
浪走蒙細  
磚走泥磅  
金沙大拍  
雲崖暖  
渡橋橫  
索寒更喜  
岷山千里  
雪三軍過  
後盡開顏

七律·长征

■刘文君